

晚唐小品作家文学思想探源

李秀敏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西临汾, 041004)

摘要: 晚唐小品作家在诸多篇章中明确阐明了自己的文学思想。而这些文学思想均源自于中唐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韩愈、柳宗元, 是在继承韩柳所倡导的“文以明道”“不平则鸣”等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它们充实丰富了中唐古文运动的理论内涵, 并对后世, 尤其是北宋古文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文学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关键词: 晚唐小品; 中唐古文运动; 文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1)02-0156-05

晚唐小品以其斐然的成就, 于唐之季世形成一个创作高峰。而综观以孙樵、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为代表的小品作家, 由于他们身逢江河日下之世, 面对晚唐日蹙的国运、民不聊生的惨境, 文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他们自觉以儒家思想为指归, 担当起救济天下之溺的重任, 充当社会批判者与拯危救世者角色, 并以饱蘸愤激之情的笔墨, 对晚唐的重重积弊一一加以讽刺。因而中唐古文作家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文以明道”“不平则鸣”等文学思想激起他们的共鸣, 他们不仅于文中径言对韩愈的企慕, 如皮日休在《请韩文公配享太学书》中云:“文公之文, 蹴杨、墨于不毛之地, 蹂释、老于无人之境, 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 千百士之作, 释其卷, 观其词, 无不裨造化, 补时政, 繫公之力”^{[1](88)}。而在实际创作中也自觉继踵韩愈、柳宗元的文学思想, 以“明道”作为自己为文崇尚, 反对绮靡文风, 以文针砭时弊, 发挥文学裨补时政的功用。可以说晚唐小品作家的文学思想无论是站在扶树儒道立场上的“上规时政, 下达民病”^{[2](3695)}“上剥远非, 下补近失”^{[1](2)}, 还是反对绮靡文风的“夫文者道之以德, 德在乎内诚, 不在乎夸饰者也”^{[3](270)}, 抑或是根据自身创作经验的“古之士, 穷达必形于歌咏, 苟欲见乎志, 非文不能宣也, 于是为其词”^{[1](236)}、“文病而后奇, 不奇不能骇于俗”^{[4](264)}之论, 均能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思想中探得源头。晚唐小品作家的这些文学思想充实丰富了中唐古文运动的理论内涵, 并对后世, 尤其是北宋古文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文学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一、“文以明道”

晚唐小品作家为文崇尚“明道”, 显然是承继中唐古文运动的传统。

“文以明道”是中唐古文运动的核心理论, 是韩愈、柳宗元在总结前人关于“文”“道”关系论述的基础上确定的古文运动的指导思想。韩愈《争臣论》云:“君子居其位, 则思死其官; 未得位, 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5](65)}清楚表明自己的创作宗旨就是“明道”, 即以文章作为表现儒家思想的载体。与韩愈同为古文运动领袖的柳宗元, 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指出:“圣人之言, 期以明道, 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 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 辞假书而传, 要之, 之道而已耳。”^{[6](886)}认为写文章的目的是“明道”, 读文章的目的是“之道”, 文辞只是传达“道”的手段、工具。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又说:“始吾幼且少, 为文章, 以辞为工。及长, 乃知文者以明道, 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 务采色, 夸声音而以为能也。”^{[6](873)}更明确地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原则。

晚唐大多数小品作家在思想上继踵韩愈、柳宗元, 也将“明道”作为为文的崇尚。孙樵较早地在创作中承继韩柳“文以明道”传统, 重申文学经世致用的主张。他明确提出为文的目的应是“上规时政, 下达民病”。(《骂僮志》)^{[2](3695)}他本人的小品创作, 也实践了这一理论

收稿日期: 2010-08-25; 修回日期: 2010-11-24

基金项目: 山西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YS08019)

作者简介: 李秀敏(1973-), 女, 吉林长春人, 文学博士, 山西师范大学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唐宋文学。

主张,以明道济物为己任。年辈稍晚于孙樵的皮日休,也强调文学裨补时政的社会功能,认为文学应做到“上剥远非,下补近失”^{[1](2)},否则就失去其存在价值。他在《陆贾序》中云:“圣贤之文与道也,求知与用”^{[1](17)},明确表明自己为文旨在明圣贤之道,以求有用于世。他在《悼贾》篇中谈及贾谊《新书》时也说:“余尝读贾谊《新书》,见其经济之道,真命世王佐之才也。……则《新书》之文,灭胡、越而崇中夏也。是以其心切,其愤深……”^{[1](17)}从文章经世致用角度赞颂《新书》的优长。在《桃花赋序》中更是郑重地宣称,自己为文是“非有所讽,辄抑而不发”^{[1](9)},将文章视作讽刺、鞭挞丑恶社会现实的载体,强调文学作品干预现实的社会功用。他于《请孟子为学科书》一文中说:“夫庄、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读之可以为方外之士,习之可以为洪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时补教为志哉?”^{[1](89)}又于《移成均博士书》中云:“夫居位而愧道者,上则荒其业,下则偷其言。业而可荒,文弊也……”^{[1](90)}对无益于裨补教化之文进行严厉指斥。罗隐在《谗书重序》中同样声称:“君子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3](241)}他虽牢落不遇,对于文学仍抱有讽刺时弊、救济时政的期待。刘蛻在其文集自序中也说:“盖覃以九流之文旨,配以不竭之义曰泉,崖谷结珠玑,昧则将救之;云雷亢梁盛,干则将救之。予岂垂之空文哉!”^{[2](3661)}显示出自己为文的宗旨与抱负。黄滔在《与王雄书》中则更明确地说,自己为文虽是“出于穷愁”而有意识的创作,但宗旨则必定为“指陈时病俗弊”^{[2](3843)}。陆龟蒙在《苔赋序》中批评江淹所作《青苔赋》缺乏惩劝之道,废弃化下讽上之旨;在《蚕赋序》中又云“荀卿子有《蚕赋》,扬泉亦为之,皆言蚕有功于世,不斥其祸于民也。余激而赋之,极言其不可。能无意乎?诗人硕鼠之刺,于是乎在”^{[4](203)},更鲜明地表明自己针砭时弊,发挥文学裨补时政功用的为文主张。

晚唐小品作家在将“文以明道”作为创作宗旨的同时,也不断更新着这一理论。诚如葛晓音所言:“继承和发展古文运动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韩柳变革古文的基本精神,不断适应现实的需要更新‘道’的内容和文的形式,提高古文的思想和文学价值。曲解和模仿必然使散文走向衰落。”^{[7](207)}这从侧面道出小品于晚唐所以繁盛的一个重要原因:从社会现实出发,更新了“道”的内涵。如皮日休继承古文运动传统,强调儒学道统,以明道济物为散文创作宗旨,这是他与韩愈、柳宗元相同之处;不过他更想以文为工具,明“经济之道”。他不仅在《桃花赋序》中强调文章的实用性,在

《鹿门隐书》中更以药为喻,告诫人们应重视文学的实用性:“文学之于人也,譬乎药,善服有济,不善服反为害。”^{[1](92)}由于重视文学的实用价值,他更强调以“文”来“裨造化、补时政”,凡有所作,必须针对现实,具有强烈的批判锋芒。综观皮日休一生中的优秀作品,特别是编入《皮子文藪》中的前期之作,确实贯彻了这一主张。正如他于《文藪序》中云:“赋者,古诗之流也。伤前王太佚,作《忧赋》;虑民道难济,作《桥赋》;念下情不达,作《霍山赋》;悯寒士道壅,作《桃花赋》。《离骚》者,文之菁英者,伤于宏奥,今不显《离骚》,作《九讽》。文贵穷理,理贵原情,作《十原》。太乐既亡,至音不嗣,作《补周礼九夏歌》。两汉庸儒,贱我左氏,作《春秋决疑》。其余碑、铭、赞、颂、论、议、书、序,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1](2)}与韩、柳相较,皮日休更强烈地强调文章现实针对性与批判的深广度。可见,从“文以明道”的角度来看,皮日休的理论直契韩、柳,但就强调批判现实、有补政教而论,又胜过韩、柳。陆龟蒙也强调文章应具惩劝之道、化下风上之旨与美刺精神,与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理论相近。不过不同的是,“惩劝”“化下风上”“美刺”本是儒家传统诗学理论,陆龟蒙不仅将之引入自己的散文创作理论,并以之指导自己的实际创作,令其讽刺小品成为鞭挞黑暗腐朽社会的锐器。

晚唐小品作家为文崇尚“明道”的同时,对浮靡文风有一种本能的排斥,这无疑亦是承继韩愈、柳宗元的创作精神。

韩愈与柳宗元本着“文以明道”的观点,对当时过分追求文采而无益于世的文风加以批判。柳宗元甚至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一文中言:“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6](825)},认为专务文采,崇尚藻饰,歪曲事实,以致于诬怪、阔诞的作品,对后世危害尤大。可见,柳宗元基于“文以明道”的原则,从文章内容本身出发,对过分追求文采,陷入虚浮藻饰的形式主义怪圈中的作品进行了强烈驳斥。

秉承韩愈、柳宗元创作精神的晚唐小品作家,居于风气败坏的晚唐文坛,也强烈排斥浮靡文风。罗隐在《河中辞令狐相公启》中言“某闻歌者不系声音,惟思中节;言者不期枝叶,所贵达情”^{[3](297)},认为文章的优劣不在夸饰,乃在于准确表达作者的情感。他又在《理乱》中云:“然夫文者道之以德,德在乎内诚,不在乎夸饰者也。”^{[3](270)}确切表明写作应重视文章内涵,亦即有德,而德之来源,则源自文人内心之诚,

显然,他认为创作应着重于文章所展现的内在精神,并非夸饰的外在形式。此文又云:“且夫文者示人有章,必存乎简易。简易则易从,将有耻且格。……有耻且格,则教化无不行。”^{[3](270)}从文采与内容的关系角度,再次坦言自己重内容轻形式的观念。孙樵在《乞巧对》中言:“彼巧在文,摘奇摹新,辖字束句,稽程合度,磨韵调声,决浊流清,雕枝镂英,花斗窠明。至于破经碎史,稽古倒置,大类于俳,观者启齿。下醜沈、谢,上残《骚》、《雅》,取媚于时,古风不归。”^{[2](3693)}明确表明对追求华艳声韵的便巧文风的强烈不满,与柳宗元的观点自有相侔之处,这些对于矫正晚唐的华靡文风,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晚唐小品作家对“文以明道”这一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于衰败腐朽的晚唐,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使他们的讽刺小品在批判现实方面表现得特别尖锐,显示出引人注目的气势与锋芒。

二、“不平则鸣”与“穷苦之言易好”

晚唐小品作家生逢垂垂末世,世衰俗弊,个人的沉沦不偶,激荡着小品作家们的心灵,因而在创作理论上易与“不平则鸣”之说达成共识。

中唐古文家们在提出和实践“文以明道”这一理论的同时,又提出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这就是“不平则鸣”说。这一理论见于韩愈的《送孟东野序》,认为文章创作乃是主体由于外物激发而产生的思想感情的宣泄。序中指出,作者的感触既与时代、国家的兴亡盛衰有关,又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所谓“不平”,泛指心灵的感触,并非专指郁闷、愤慨而言。诚如钱钟书所言:“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他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先秦以来的心理学一贯主张:人‘性’的原始状态是平静,‘情’是平静遭到了骚扰,性‘不得其平’而为情。……不论什么情感都是‘性’暂时失去本来的平静……”^{[8](107)}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在言及情感与艺术创作的关系时,虽就书法而论,但却进一步阐明了这一理论:认为情感是创作的动力,艺术是情感的表现,并且强调进行创作时作者须将浓烈的情感倾注其中;而情感既包括源自人生遭际的“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5](158)},也包括观赏外物而产生的审美感受,二者均是由外物激发而致。在这篇序中,韩愈还明确指出,作者须“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5](158)},作者只有内心时常激动不平,方能创作出生动感人的艺术作品。韩愈虽一再说明,“不平

所鸣”的情感既可为欢乐愉悦之情,亦可为怨悱愤激之情,不过对他而言,则更偏于因怨愤不平而鸣的一面。他在《上宰相书》与《上兵部李侍郎书》中就明确表明自己常自觉以诗文宣泄心中的忧愤。和韩愈一样,柳宗元也极力主张以诗文舒泄愤懑,其言论虽不及韩愈多,却也说得明白透彻。他在《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中云:“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而遁隐之志息焉。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故形于文字,伸于歌咏,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为也。”^{[6](644)}其中也明确表明自己以诗文释忧抒愤之意。

晚唐小品作家居于窳败之世,衰颓的世风,襟怀难展的个人遭际,时时在其内心深处掀起波澜,因而“不平则鸣”之说,极易引起他们的共鸣。皮日休在《松陵集序》中云“古之士,穷达必形于歌咏,苟欲见乎志,非文不能宣也,于是为其词”^{[1](236)},即是将创作看作宣泄心中情感的一种方式,这一观点直接继承了韩、柳所提出的“不平则鸣”说。与韩柳相比,皮日休则更重视作家抒写个人失意不偶的情怀,这一点,在他的《九讽系述并序》里,有着比较详尽、深入的阐述。序文开篇即直言屈原的作品源于放逐时抑郁难遣之怀:

在昔屈原既放,作《离骚经》,正诡俗而为《九歌》,辨穷愁而为《九章》。^{[1](11)}

他充分肯定了屈原这些抒发自己失意牢骚和愤世嫉俗的作品,并指明汉代相应的仿效之作。他比较欣赏扬雄的《广骚》、梁竦的《悼骚》,正是因为它们本身宣示出一种失意不偶、悲愤怨抑的情怀。而他对于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等作品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他们虽为屈原作品的仿效之作,却仅是“嗜其丽词,撝其逸藻者也”^{[1](11)},缺乏屈原作品中那种“骚怨”精神。最后,皮日休又进一步强调自己的这篇《九讽》,正是承继屈原以创作抒写失意不偶情怀的传统,来发抒自己心中的怨抑:

昔者圣贤不偶命,必著书以见志,况斯文之怨抑欤?噫!吾之道不为不明,吾之命未为未偶,而见志于斯文者,惧来世任臣之君因谗而去贤,持禄之士以猜而远德,故复嗣数贤之作,以九为数,命之曰《九讽》焉。呜呼!百世之下,复有修《离骚章句》者乎?则吾之文未过不为乎《广骚》、《悼骚》也。^{[1](11)}

重视抒写人生失意不偶的为文宗尚,由此可见一斑。他的《悼贾并序》一文也说:“(贾)生自以不得志,哀屈平之放逐,及渡沅、湘,沉文以吊之。”^{[1](17)}屈原的遭际,不仅令同样沉沦不遇的贾谊叹息不已,也激起皮日休心灵的共鸣,“余悲生哀平之见弃,又生不能

自用其道”，并进一步说道：“吾之道也，废与用，幸未可知，但不知百世之后，得其文而存之者，复何人也。”^{[1](17)}语辞委婉含蓄，不过字里行间不仅是对屈原、贾谊不幸遭遇的哀悼，也是对自己志不获骋的喟叹，更是自己意欲以文章抒写人生失意情怀的隐曲表述，所阐明的正是与韩愈、柳宗元一脉相承的“不平则鸣”说。

陆龟蒙、罗隐均有与皮日休相近似的言论。陆龟蒙在《笠泽丛书序》中云“内抑郁则外扬为声音，歌、诗、颂、赋，铭、记、传、序，往往杂发”^{[4](228)}，表明自己藉创作来抒发内心的情感，从而宣泄胸中的愤懑。罗隐在《谗书·重序》中直言：“盖君子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位，则著私书以疏善恶”^{[3](241)}，既遥承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也与韩愈、柳宗元所主张的“不平则鸣”有着内在的统一性。

此外，陆龟蒙还自觉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穷苦之言易好”理论。“穷苦之言易好”理论，是韩愈在“不平则鸣”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成。他在《荆潭唱和诗序》中云：“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句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5](154)}认为文章优劣与个人遭际息息相关，身罹不幸之境、困窘不堪之人，抑郁积胸，发而为文，必使文章臻于精工。不过韩愈仅是客观地指出文学作品优劣与个人遭际的关系，而陆龟蒙除意识到这一联系外，尚能挖掘造成“穷苦之言易好”这一文学现象的社会根源。他在《书李贺小传后》中曾无限悲愤地慨叹道：“吾闻淫畋渔者谓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抉摛刻削露其情状乎？使自萌卵至于槁死，不能隐伏，天能不致罚耶？长吉夭，东野穷，玉谿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4](270)}李贺仕进不能过早夭亡，孟郊屡试不第困穷潦倒，李商隐挣扎于党争的漩涡中抑郁而终，不幸的遭逢确实令其创作出卓异不群的文学作品，不过他们终究因在不公平社会无法容身，在困窘与失意中离世而去。陆龟蒙将此归咎于“暴天物”的封建统治者，见解深刻，同时也深化了韩愈“穷苦之言易好”说之理论内涵。

三、“尚奇”

孙樵、陆龟蒙为文宗尚奇崛、怪奇，其文学主张显然与韩愈一脉相承。

韩愈为文尚奇，自称“少小尚奇伟”（《县斋有怀》），他在《答刘正夫书》云：

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

则共观而言之。……若皆与世沉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赖而用也，然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文，岂异于是乎？^{[5](121)}

认为“怪奇”的文风，是自我风格的彰显，艺术的独创。他在《送穷文》中也曾言“不专一能，怪怪奇奇”^{[5](329)}，明确表明自己对怪奇文风的自觉追求。韩愈以此理论指导实际创作，自己的散文也呈现出奇崛的风格。

晚唐小品作家孙樵为文同样主张“趋怪走奇”，他在《与王霖秀才书》中云：

鸾凤之音必倾听，雷霆之声必骇心。龙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储思必深，摘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以之明道，则显而微，以之扬名，则久而传。^{[2](3690)}

要求为文“趋怪走奇”，但必须归结到奇正相生。他在《与友人论文书》中又云：“古今所谓文者，辞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焕然如日月之经天也，炳然如虎豹之异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则显而微，以之扬名，则久而传”^{[2](3690)}。他并不以形式上的“怪奇”为务，而是以一定的现实内容为基础，包含有强调艺术的独创性与艺术形式的特殊作用的合理内涵。

陆龟蒙为文也提倡“怪奇”。他在《怪松图赞并序》中提出“文病而后奇，不奇不能骇于俗”^{[4](264)}的观点，表明自己从文章社会效应的角度追求文风的“怪奇”。这显然是对韩愈“尚奇”为文主张的借鉴。不过对陆龟蒙而言，他虽吸纳了韩愈的“趋奇骇俗”理论，但对“奇”却另有一番独特见解：

天之赋才之盛者，早不得用于世，则伏而不舒，熏蒸沉酣，日进其道，权挤势夺，卒不胜其阨。号呼呶击，发越赴诉，然后大奇出于文彩，天下指之为怪民。呜呼！木病而后怪，不怪不能图其真；文病而后奇，不奇不能骇于俗，非始不幸而终幸者耶？^{[4](264)}

他认为文风的“怪”与“奇”同个人身罹的遭际和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是作者愤激之情的真实展现。他进而出人意料地将“怪”与“真”联系在一起，提出“不怪不能图其真”，认为“怪”是“真”在特定条件下的变形与异化，“真”是“怪”的内在本质与原形。换言之，即是主张为文应由情感内容上的“真”与“实”，向形式上的“怪”与“奇”进行开拓，从而令文章兼具真实的情感内容与奇崛怪怒的形式。此种理论显然是进一步发展了韩愈的“尚奇”理论。

由此可见，晚唐小品作家的文学思想源自于中唐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韩愈、柳宗元，是在继承韩柳文学思想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文学思想不仅充实

丰富了中唐古文运动的理论内涵，而且也成为沟通中唐古文运动与北宋古文运动文学思想的一座桥梁。

参考文献：

[1] 皮日休. 皮子文藪[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2] 董诰. 全唐文[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3] 罗隐. 罗隐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4] 陆龟蒙. 甫里先生文集[M].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6.

[5] 马伯通. 韩昌黎文集校注[M]. 北京: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6] 柳宗元. 柳宗元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7] 葛晓音. 汉唐文学的嬗变[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8] 钱钟书. 七缀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On source of essayists' literature thought in late Tang Dynasty

LI Xiumin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4, China)

Abstract: Essayists elucidated their literature thoughts in a lot of creations definitely in late Tang Dynasty, which derived from Han Yu and Liu Zongyuan who were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ancient-style prose movement in middle Tang Dynasty. These essayists in late Tang Dynasty developed theories such as “expressing Dao by literature” and “injustice provokes outcries” that Han Yu and Liu Zongyuan advocating further basing on inheritance. These theories enriched and affluenced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ancient-style prose movement in middle Tang Dynasty, and had an important effect on later generation, especially on ancient-style prose movement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won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inking.

Key Words: essays of late Tang Dynasty; Ancient-Style Prose Movement in middle Tang Dynasty; literature thought

[编辑：苏慧]

(上接第 150 页)

The idea of salvation through appreciation of the beauty in Wang Guowei's literary criticism

ZHU Wei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Wang Guowei's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his criticism does not only include the idea of transcendence through appreciation of the beauty, but also the idea of salvation through appreciation of the beauty, whose relationship can be interpreted as follows: the former is the basis of the latter, while the latter is the result of the former. This article aims at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reconsidering the debates like the “aesthetic ideology” existing in the contemporary circle of literary criticism.

Key Words: Wang Guowei; literary criticism; transcendence through appreciation of the beauty; salvation through appreciation of the beauty

[编辑：胡兴华]